

胡乔木之女、红二代胡木英谈延安精神传承

我们开团拜会，只有一碗清茶

本报深度记者 陈玮
见习记者 张红光

谈反腐>>

腐败与我接受的教育完全格格不入

齐鲁晚报:在2月份的延安儿女联谊会团拜会上，您提到拥护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反腐，呼吁红二代“不打横炮、不帮倒忙”。对这段话，社会上产生了很多版本的解读，有人说是上层授意，是不是？

胡木英(哈哈大笑):其实我了解国家动向的唯一途径就是《人民日报》。那次发言是我把大家平时的议论，和在会前征求的一些同志的意见综合起来，然后由我起草而已。

齐鲁晚报:你们每年都搞团拜会？

胡木英:团拜会始于延安，是毛主席倡导的。毛主席为了杜绝下属向领导送礼拜年影响工作，就在年前把同志们召集在礼堂，人手一碗清茶，进行“团拜”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团拜会，是从1984年开始的，我们已经坚持了30年。每年农历的年初，我们延安儿女聚到一起，没有宴席，没有礼品，只有一碗清茶，不讲究排场，简单朴素。

当时那段话的讲话现场，有不少人鼓掌。后来很多家网站转载。网民也有大量评价，有赞扬的，也有不少反对的，甚至过度解读的。

我说“不打横炮、不帮倒忙”，确实是针对社会上和红二代个别人言行说的。现在有些人拿“文革”说事，这是在有意无意地帮倒忙。对此，我有一句话，叫认清形势。我们一定要维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的政策和决定，深刻理解好形势的内涵所在。

齐鲁晚报:您所说的“认清形势”是什么？

胡木英:就是现在的主要任务。现在的形势相当复杂，习近平总书记要在这种形势下，采取有效的办法，集中打老虎拍苍蝇，我们应该集合社会各种力量支持中央做这样的事情。

我们之所以支持习近平总书记的“新政”，就是因为社会上的贪腐现象，已经到了不得不整治的地步。总是有人说，习近平总书记的主张，对公务员队伍太狠心了。我听到以后很生气，说这话的人怎么不觉得他们做得太过分了呢？这些贪官是30多年积累下来的，并非突然出现的。一开始只是偷偷摸摸跑官行贿，后来越来越公开了，不知不觉得走到现在这一步。

齐鲁晚报:您为何对腐败如此痛恨？

胡木英:腐败，与我原先接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，完全格格不入。这种风气持续蔓延，延安精神就会渐渐消亡，而党最核心、最得民心的东西，也会逐渐消失。

谈父亲>>

一封印象深刻的家书

齐鲁晚报:您一直在说传承延安精神，您所认为的延安精神是什么？

胡木英: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。共产主义信仰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第二，父辈与老百姓深厚的天然感情。他们从老百姓中走出

“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举起了反‘四风’、反腐倡廉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运动的旗帜，向弥漫多年的歪风邪气、向老虎苍蝇们开刀，动真格的了……总之，这场斗争极为复杂艰难，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！”今年2月，在延安儿女联谊会的团拜会上，胡木英公开发言，支持党中央的“反腐斗争”。

胡木英的发言，在网上引起一片议论声。因为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是一个以红二代为主体的社团组织，这里面的人身份既普通又特殊。会长胡木英是国家工商总局的一名退休干部，她的另一个身份才引人注目：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的女儿。

胡木英的这次高调发言，意味着什么？3月1日，齐鲁晚报记者走近胡木英，听她讲述他们心目中的延安精神，以及对这场“你死我活”斗争的看法。



3月3日，北京，胡木英接受采访。 见习记者 张红光 摄

来，学了本事，长了知识，然后再走向老百姓，一切都在为人民服务，所做所为都离不开他们。

第三是实事求是、求真务实的作风。做事要规规矩矩，做人要诚实，表达最真实的想法，不要遮遮掩掩。

齐鲁晚报:说到延安精神，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？

胡木英:我记得是在1964年，我在外交学院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。当时入党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为了积极入党，我在参加大学生挖运河锻炼时，因太劳累，还患上了肾炎。为此，父亲写了一封很长的亲笔信，告诉我这不代表有什么值得骄傲自满的地方。如果你有一天终止奋斗，不求进步，你随时可以把自己降低为落后分子。

这是我们当时所受教育的一个缩影，父母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，就是共产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所以你要参加到这个为人民服务的队伍中去。这封信我至今还保存着。

齐鲁晚报:您曾说传承延安精神，是延安儿女义不容辞的责任？

胡木英:作为“红二代”的我们，理应承担起传承的历史使命。我们很少像其他孩子那样享受到父爱和母爱，我们中一些人的父母都为革命流血牺牲了，这些人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有见过。所以从懂事起，我们就受到革命的熏陶，吃了很多苦，遭了很多难，因此也更坚强。同时这种延安精神，我们也体会得最深刻，有义务、有责任，当然也有能力去传承。

齐鲁晚报:你们是如何传承延安精神的？

胡木英:延安儿女联谊会平时会组织很多活动，一个月有好几场。比如优秀共产党员的纪念活动、组织唱红歌、观看红色题材影片并座谈等。

最近正在拍一部关于延安儿女的文献纪录片——《延安儿女的故事》，是由140多位延安儿女，讲述他们自己及父辈们经历的故事，反映老一代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，告诉人们他们是如何培养教育后代的。延安儿女联谊会组织人员成立了专门的公司，历经7年时间，拍了这部32集的文献纪录资料片。

这部片子已经通过国家相关部门审查，我们今年考虑通过

电视台或影院等不同方式向社会公开播放。

谈传承>>

为拍纪录片得找企业“化缘”

齐鲁晚报:那这些年，宣传延安精神的效果如何？

胡木英:延安儿女联谊会通过组织活动、演出、讲话、报告讲座、报刊宣传、公开的影像资料等方式，弘扬延安精神，传播延安文化，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但是，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在少数。不少人曾对我说，你讲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啊？有谁听，何必呀？

齐鲁晚报:很多人不理解你们，是吗？

胡木英:有些年轻人是不太理解。在一次大会上，联谊会副会长张亚南曾写了一首政治言志诗《一个共产党员的追求》，结果遭到一群年轻人的嘲笑；2013年春节，一次团拜会上，张亚南为老一辈鼓与呼的讲话，被人形容为“神经病”。

齐鲁晚报:那您为何还要坚持去说？

胡木英:作为延安儿女，我们再不说，那就真的没什么人说了。

齐鲁晚报:在你们宣传延安思想过程中，遇到过哪些困难？

胡木英:我们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和支持，完全是延安儿女的自愿行为，一切活动都要自筹自支。资金、场地、人员联系、影像拍摄和制作，处处都很困难，还特别繁琐。我们不断找企业“化缘”，但前提是，我们不与任何商业利益沾连。所以，我们平时开销都很有计划，能节约就节约，能省则省。

不过，岁月不饶人，“红二代”们现在也正在慢慢老去，我们的腿脚也不太方便，办事情更不方便。我们没有公车，都是坐公交、乘地铁，有的人光在路上来回的时间就得4个小时。

齐鲁晚报:这些困难都是如何克服的？

胡木英:就拿《延安儿女的故事》这部文献纪录片来说吧，我们一遍遍地联系革命后代，有时甚至要打十多个电话给他们做思想工作。启动《延安儿女的故事》的70万元资金，就是在银行系统的

“红二代”帮助下解决的。

谈身份>>

我退休时只是个处长

齐鲁晚报:大家都说您曾经是国家工商总局的大领导？

胡木英:我最后就是以一个处长的身份从国家工商总局退休的。有不少人说我是局长，可能大家以为“红二代”肯定是高官，其实不然。

齐鲁晚报:在延安儿女联谊会中，大家的身份都是怎样的？

胡木英:延安儿女中，大多是普通公务员或者科技教育文化界业务人员等。虽然我们中间也有高官、富豪，但那是少数人。这样的人在联谊会也呆不长，他们有自己的利益。还有很多“红二代”是以普通工人的身份退休的。

齐鲁晚报:不可否认，在很多人眼中，“红二代”会有很多特殊待遇。

胡木英:这是想当然的认为，其实不是这样。我们延安儿女从小就被送到寄宿制学校，从来没有机关大车接送，回家都是坐学校的班车。从中学到大学，再到“文革”时下乡劳动，我都是跟同龄人一样。没有任何特殊待遇，我还记得刚到天津郊区劳动时，床上都是跳蚤，打都打不完。

社会上有些人说我们保卫延安精神，红色江山是为了继承父辈“江山”，继承特权，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，他们就太不懂我们了。只要看看我们的学习、工作，了解我们退休后的情况就明白了。

齐鲁晚报:这种“草根”身份，给你们带来了什么？

胡木英:我们对于形势政策的判断，也是看最广大老百姓是否得益。我记得父亲曾经带着我到湖南湘潭农村去调研，父亲和农民的感情特别深，了解他们的生活现状。他们与工农之间的深厚感情以及没有任何利益纠葛的纯粹，让我受益匪浅，这些正能量的东西是无可替代的。

记者手记

“如果不站出来，就没人说了”

本报深度记者 陈玮
见习记者 张红光

“我出生一个多月就得了肺炎，当时，延安缺医少药，是警卫员举着中药，游过延河，送到延安中央医院后，我的病才得以治好。可以说是延安的叔叔、伯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”

一张简易的木质办公桌，一把有些落漆的椅子，一块已经破旧不堪的窗帘，搭成了他们梦想已久的“摄影棚”。在“摄影棚”里，一位七旬老人端坐其中，讲述着他们在延安的童年。

这是纪录片《延安儿女的故事》中的一个影像。而制作这些光盘的发起人，就是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，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、胡乔木的女儿——胡木英。

3月1日，北京，初见胡木英，她就把这几张光盘送给我们。

“延安精神需要不断传承下去。”胡木英说话干脆而有力，这是她给本报记者正式说的第一句话，也是重复最多的一句。

走在大街上，看不出胡木英跟其他退休老太太有什么区别。然而，频频的公开讲话，与她低调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。曾经做过胡木英专访的口述历史专栏作家周海滨说，胡木英组织活动，是一定要上台讲话的，每年的团拜会、相关纪念活动，都少不了胡木英的身影，内容不外乎针砭当今社会的种种乱象，最终落脚肯定是要发扬延安精神。

和胡木英谈不了腐败，只要一提腐败现象，胡木英就慷慨不已。在与记者的交谈中，她下意识皱起眉头，用手指使劲地敲着桌角，提高嗓门，引来周围人的注目，不知道这个老大太为什么说起话来咬牙切齿。“现在有些官员，除了忙着怎么升官，怎么跑官，就是忙着怎么捞钱。为什么不替这么多老百姓担心啊？”

然而，尴尬的是，频繁的公开呐喊与坚定的表态，并没有让胡木英的声音成为主流。胡木英担任会长的延安儿女联谊会，有人也因此种原因退出。

周海滨说，胡木英作为“红二代”的“精神领袖”，其表达欲望是非常强烈的。这和她的成长经历、价值观念以及教育影响密不可分。现实社会上的贪腐、浪费以及奢靡、享乐、吃喝之风的盛行，与他们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，甚至水火不相容。

“但是这种观念现在并非主流，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认同，再加上没有绝对的话语权，如今，其实并没有太大影响力。”周海滨说。

然而对于胡木英来说，她并不接受这样的现实，只要有宣传纪念活动，她就尽可能联系人员参加。《中共中央第一支笔》的作者丁晓平说，每年的团拜会胡木英都会打电话邀请他参加，《延安的精神》光盘放映活动，胡木英多次打电话给他，直到他来观看为止。

胡木英说：“如果不站出来，那就没有人说了。”

深入、更见精彩

电话:96706056

洪波工作室

邮箱:hongbogongzuoshi@163.com